

责任编辑： 张艳华

震惊世界的核警告

〔苏〕尤·谢尔巴克著

冀元璋 刘生文译 杨春华校

•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门外水碓子东里24号)

北京东光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60毫米 32开 印张：6.625 字数：100千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ISBN7—80041—069—2/G·65

定价：1.80元

序

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之时起，已经过去一年了。

仅仅过去了一年。

一年之前的那个切尔诺贝利世界是平静的，从容不迫的，过于自信的。多年来，它一直处于似睡非睡的、自由放纵的状态。然而，现在我们却感到它又是那么的遥远、安逸、恬静。

对所有同切尔诺贝利的悲剧直接或者间接有关的人来说，时间仿佛被劈成了不相等的两半：1986年4月26日之前和之后。我们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之一——阿涅莉娅·彼尔科夫斯卡娅说得恰如其分：“这次事故很象一场战争。我们市委的所有同事迄今还有一条分界线：战前和战后。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

仿佛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由于放射性元素增加，使它蒙上了一层无形的、令人可怕的阴影。我们看到的东⻄，即使在前一夜最奇妙的梦幻中，也很难想象得出来，虽然，总的说来，一切都显得相当平常。后来，我来过这里几次之后，才渐渐习以为常……

但第一次……

这是一座没有居民的城市，它既没有年轻人的喧闹，也没有那种当地居民特有的从容不迫的气氛。护窗板封闭着，所有房子、机关和商店都关着门。在消防分队附近五层楼房的凉台上，放着几辆自行车，凉着几件衣服。城里没有生命，即使到了早晨，也听不见奶牛的哞哞声，只有失去主人的野狗在东奔西跑，母鸡在咕哒咕哒地叫着，小鸟在林中跳来跳去。然而，鸟儿并不知道，粘有尘埃的枝头正是扩散辐射物的地方。

但是，即使是一座被居民放弃的城市，也并不是没有希望，它在生存和斗争着，在按照原子时代非常状态下的严格的和崭新的规律生活着。在市内及其周围，集中了大批机器：强大的推土机和拖拉机、起重机和平土机、挖沟机和混凝土车。在区委对面，在列宁纪念碑旁边，停放着一辆装甲运输车，一个戴着防毒口罩的年轻战士在向外张望。在斑驳陆离的伪装网下，放着无线电台和军用卡车。

年12月14日的通告中，对此作了初步总结。通告中令人难忘的数字和事实表明，在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业已毁坏反应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在国内外的实践中，还没有类似的做法。

充分认识已经发生的事故（我们把它比作卫国战争）是未来也许更遥远的事。今天，任何一个作家或者新闻记者，无论他多么博学，都无法办到。我相信，一部切尔诺贝利的长篇史诗（我始终在想，我们会看到这样的长篇史诗）必将以排山倒海之势，触及人们生活的根本问题：生与死、战争与和平、过去和将来，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长篇史诗将充分表现出切尔诺贝利悲剧的全貌，并以它多声部的音响，对真正的英雄人物给予当之无愧地颂扬，对容忍事故及其严重后果的罪犯（应当对所有的人点名！）给予无情地揭露。它还将以准确无情的数字和事实，描述事件参与者的生活环境、服务态度以及人类的希望和他们所采取的道德立场。我认为，创作这样的长篇史诗既需要有新的方法，也需要有新的文学形式。可以说，它与《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的文学形式有所不同。究竟什么样的文学形式？我不知道。

可现在……现在我想奉献给读者的，是一本独特的文献，事实和目击者见证的剪辑。因为事故发生后不久，我有机会不止一次地到过站区及邻近

一个城市，大约1160年罗格沃尔德向那儿委派了符谢沃洛德·格列鲍维奇。在这位大公管辖时期，后来被称作切尔诺贝利的斯特列热夫就被当成了诸侯公国的封地。

在1193年的年鉴中，斯特列热夫已被易名为切尔诺贝利……

作者详细叙述了切尔诺贝利所走过的复杂的历史道路和历代统治者的情况。17世纪末，切尔诺贝利又落到波兰大地主霍特凯维奇手里，直到十月革命前，这块两万多俄亩的土地都属于他。

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上，也曾奇怪地闪现出切尔诺贝利镇的名字：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出生在切尔诺贝利的26岁的波兰大美人罗莎莉娅·柳鲍米尔斯卡娅—霍特凯维奇，由于被指控与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及其他王室成员有牵连，1794年6月30日，在巴黎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这位大眼睛、黑眼珠、淡黄头发的女子，以“切尔诺贝利籍的罗莎莉娅”的名字，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古老的切尔诺贝利将自己苦涩的名字（因为“切尔诺贝利”意为一种普通的洋蒿）又献给了巨大的核电站。它于1971年开始兴建，1983年四个动力机组的发电能力为40亿瓩。不仅在国外，就是在国内，尽管报刊和电视上作了那么多报道，但是，很多人迄今仍不十分明白，或完全不明白，切尔诺贝

思维，以弥补用感觉器官和德国盖革计数管研究环境的习惯方法（比如显微镜检查、化学实验）。

切尔诺贝利及其周围的污染物质飘扬在芬芳的空气里；撒落在白里透红的苹果花和杏花上；混杂在街道马路的尘埃中；溶化于乡村的井水、牛奶里和绿茵茵、清新的菜园中；扩散到整个春天悠静的自然界。是啊，难道仅仅是污染了春天的大自然吗？

直到秋天，远在波列斯克地区，在同维尔察村和泽列纳亚·波列雅纳村的村民交谈中，我才确信，原子时代的新要求不只是进入了人们的意识，也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那过时的、祖祖辈辈形成的农民生活方式，同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的世界的新现实发生了矛盾。常言道：“连故乡的烟，我们都感到又香又甜……”。正因为如此，这里禁止烧柴禾，非常困难。据放射剂量检查员说，要从庄稼人的草房顶（农舍屋顶）清除放射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烧毁树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维尔察村，只要把放射剂量仪拿到院子里粗心大意的主人燃起的篝火旁，就会发现仪器上显示的数字急剧升高。这时，人们对此才深信无疑。按一位医生准确的比喻，波列斯克村的每一个炉堂都可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第四号核反应堆。因此，给村民们运来了煤炭。

一年前，谁能知道，辐射高于正常水平，不仅显示在蘑菇上、泥炭田里、茶藨子上，而且也显示

的、里面设有娱乐场的公园。

“根据总的规划，普里皮亚特将成为一个8万人口的城市。位于林区低地的原子城将成为乌克兰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这本颜色鲜艳的纪念册是亚历山大·尤利耶维奇·艾萨乌洛夫在普里皮亚特的“白宫”——一座空闲的行政办公大楼里赠送给我的。他是普里皮亚特市执委会副主席，我们这本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我和他沿着死气沉沉的走廊走着，看了看那些空闲的办公室里被移动的家具，抛落在地上的纸张，被打开的保险柜，在一些政府委员会开会的地方，有门上成堆成堆的“百事可乐”瓶（为了留作纪念，我从门上撕下了几张谁曾在此办公的名片），还有翻到4月25日的报纸合订本，花盆里已经凋萎的花草……在所有这些东西上还散发着令人晕旋的消毒气味——为的是不让老鼠繁衍滋生。

那一天，我和艾萨乌洛夫来到这座被放弃的美丽城市，这里仅有几个居民。另外，还有几个值勤巡逻的民警。他们在保卫被居民“抛弃”了的家园。

如今城门口不再是备有娱乐场的公园，而是备有信号系统的结结实实的铁丝网，以此来防范那些不逞之徒偷偷钻进站区，抢劫成千上万的住宅里留下的被辐射的物品，因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的因素”的夸夸其谈者，都变成了平庸的胆小鬼和败类，而那些默默无闻的、平凡的劳动者，才是真正的英雄。

老消防队员格利戈里·马特维耶维奇·赫梅尔“老大爷”就是一个例子。他按照农民的方式慢条斯理地叙述道：他和他的两个当消防队员的儿子，在核电站发生事故时不仅受了苦，而且分别住进了莫斯科和基辅医院，妻子被从普里皮亚特河附近的村庄疏散到博罗季诺区并继续工作；给在旷野的机务人员烧饭和送饭……我们所涉及的那些文学性的和生活性的问题，因而也常是琐屑而又乏味的问题，怎能与这些品德高尚的人们的悲壮事迹相比呢？赫梅尔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乌克兰人，听着他的叙述，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了果戈理的《塔斯拉·布尔巴》。

当我了解和看到了切尔诺贝利的情况之后，在一段时间里，我似乎感到，我再也不会提笔写作了，因为所有的文学传统形式，一切体裁的奥妙和结构的精巧（对我来说），都成了完全脱离真实、矫揉造作和无用的东西。事故发生前不几天，我刚写完了一部《原因与后果》的长篇小说。它所描写的是一些在特殊危险的传染病实验室里的医生，如何同类似狂犬病一样的不治之症作斗争的情形。虽然小说的某些情节，就其情况的奇怪、巧合来说，好象与

传闻仍认为这篇文章颇有来头。作者将批评（非常内行和毫不留情的批评）的火力集中到第五号动力机组的建设上，说将它的建造工期由3年压缩为2年。柯瓦列夫斯卡娅列举了一些令人发指的不负责任的事实和敷衍了事的行为。譬如说，1985年，供给机关少给了2358吨金属结构，而且，还多为废品。更有甚者，核燃料渣库用的326吨被覆材料是从伏尔加金属结构厂运来的废品。卡申金属结构厂也送来了大约220吨废圆柱。

“但是，要知道，这样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柯瓦列夫斯卡娅在文章结尾说，“如期建成又一个动力机组并非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建设者个人的事，加快速度是我们积极性、主动性、顽强性、自觉性的表现，是我们对国家大事应有的态度。”

老实说，当我读完这篇文章后（象很多人一样，我也是事故发生后才读的），我以为，文章的作者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头发斑白，戴眼镜的女士，因为她连所有这些枯燥的建筑术语和标准也非常熟悉。当我知道柯瓦列夫斯卡娅原来是一位年轻的、普里皮亚特《动力工程论坛报》的女新闻记者、天才的女诗人时，我又是多么地惊讶！

她有一对迷人的眼睛，那么的光亮，那么的有神，真不知道，她是在回首遥远的过去，还是在注视遥远的未来？但是，她的眼睛里不时地流露出几

的肇事者……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显然，当时我还没有达到理解这一简单而重要的真相的程度。况且，又是这样的时代，当时我的呐喊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它还不如蚊子的叫声那么有力。当时，在我之后只有《青春》和《文学报》透露了片言只语。我也刚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象在战争中一样》……我说这些，并非为了辩解，而是真实情况。

对切尔诺贝利事故，我的看法就迥然不同了。我不仅把它当作自己的不幸（我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而是将其看成继卫国战争之后，我国人民生活中一次最重大的事件。不错，作为《文学报》的特派记者，起初，我把自己的任务看得非常狭窄：无非是报道一下消除事故后果的医生们的事迹而已。但生活进程本身使我逐渐扩大了探索的范围。我会见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消防队员和院士，医生和民警，教师和核电站工作人员，部长和战士，共青团的工作者和总主教，美国的百万富翁和苏联的大学生们。

我听了他们的叙述，并用录音机录了下来。然后，当我每天晚上整理这些录音时，他们见证的真实性和真诚性，他们提供的详细情节和中肯的见解，令我一次又一次地惊叹不已。在把这些录音整理成文时，我力求既保持谈话者的语言结构及其术语或行语特点，也保留他们的语调。只有在万不得已的

“——请谈谈，有没有过这种情况：为真理而奋斗的记者往往遭受到上司的刁难？”我问。

“——从对工地的态度来看，这样说是不公正的。要是就市委或核电站管理处而言，情况确实如此。我没有去过市委，没有问过他们对文章的看法，但却有传闻，准确的传闻。我打听到，他们准备叫我去市委，可能要开除我的党籍。

“然而，就在这时事发生了……”

“我认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是那里的情况不正常，‘不速之客’是插不进去的，即使他十分精明，哪怕是高级工程师，也难以得逞。因为管理处是一个独立王国，那里的‘裙带’风盛行。那儿是高工资，他们干了坏事也拿钱，他们是按办坏事的多少而行赏的。就连工人们也写道，那里的‘裙带’风泛了滥。他们凭朋友、熟人关系办事。如果有人受了批评，所有的人就立刻不分清红皂白地替他辩护。

“如果普通工人有了过错，准得挨罚。如果管理人员、上层人物有了错，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事情甚至搞到这种程度：管理人员对工人说话粗暴、态度傲慢，甚至欺负他们，侮辱他们，狂妄态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是一个国中之国。他们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一切，人们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于是，工人们便找到编辑部，但他们有个要求，

‘千万别说出我的名字，不然，他们会把我开除，会把我整死。你们则无妨，因为你们是新闻记者。请把这一切报道出去吧！’拒绝吗？新闻记者没有做胆小鬼的权利。但又无从做起，因为不能说出人的名字。

“我当编辑的时候，并不拿着稿子请人批评。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反正没有这样做。我是文责自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新闻记者，我承担责任。

“我想为《乌克兰文学》写一系列文章。第一篇是揭露工地缺点的。第二篇嘛……第二篇本来应当写操作人员的情况，实际写的却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道德风尚。坦率地说，有些好干部也从工地去了管理处，因为那里的工资高。管理处也吸收了些专家。如果让有经验的建筑师当管理处的财产保管员，那么他便会了解整个工地的“内幕”。这种干部的价值，就在于检查他人如何为他而建设。但是，当时的工地上没有钱。难怪许多人利用休息时间出去捞外快。甚至连一些高级建筑师也不例外。那么，现在，在消除事故时，这些建筑师又工作得怎么样呢？我从报上看到，他们一个月就完成了全年的计划。要知道，他们这些人是无价之宝啊！他们不仅能很好地工作，而且愿意好好工作。

“本来，许多人去了管理处，可是，他们后来

又到编辑部来找我，他们说：‘唉，大家在工地上工作得本来很好，可是到了站上之后，这里的道德空气简直把人闷死了。好象到这儿来，是为了抢别人的位子，为了投机钻营，争权夺利。’”

“那么，他们的收入高吗？”我问。

“当然啦，300多卢布呢！总是超额完成计划，达到了‘先进’水平……此外，如果在这‘不干净的’地方工作，可以得到食品供应证、定量配给证、疗养证，总之，应有尽有。可是不知为什么，在工地上却什么也没有。在核电站，住房问题比在工地解决得快。尽管住宅是建设者们修建的，但是分房却另是一套。我虽然忘了分房的具体比例，但大体上是清楚的：管理人员占70%，而工人才占30%。”

“——在你的文章里都提了些什么重要问题？说了些什么话？”

“——人应该互相信任。我是下级，我应当信任我的编辑。为了便于我同他协商行动，就必须信任。要相信他的威望，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的见解。这正是工人应有的特征。只要管理机关的人员诚实、正派、讲原则，工人们自然会齐心干活。假如有的人对什么都满足，而另一些人对什么都不满足，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仅会产生嫉妒，而且产生不满情绪。有的人会想：别人过着富足的生活，却

还把公家的东西攫为己有；而我们为什么要象傻瓜一样地活着，听着他们的指挥去卖劲地干活。要知道，这个城市不大，领导人的任何失误和道德堕落，人们都会很快地传扬出去。所有这一切都会被评头论足，添油加醋，流言蜚语满天飞。更何况，他们还在竭力压制批评。

“从表面上看，似乎工人们的纪律很好。人人都不（仅仅是害怕）早退，但是，如果没有人看见，也就溜之大吉了。每个人都害怕迟到，但没有人看见时却经常迟到。这些都说明人们的纪律松弛、疲沓。看来，发生事故，不仅领导者有责任，那些操作人员也有过错，因为他们……”

“这就是我要写的文章，我是想指出，在纪律和破坏技术安全基本规则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设想一下，操作人员能不能坐在满是电钮和操作杆的指挥盘上工作。”

“怎么能坐在指挥盘上呢？”

“可事实就是这样。有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坐在指挥盘上，他们随随便便，毫不在乎。人们现在怎么议论呢？本来大家是相信操作系统的、然而，操作系统却没有起到保护人们的作用，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这些人竟然到了被分成两半的地步。有的人说，应该努力工作，诚实地劳动；可另一部分人则说：‘别人都没有这

么做，我又何必如此呢！’

“核动力委员会曾设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基地。我参加会议时，经常参观核电站，我们报社的人甚至没有长期通行证，管理处不发通行证是以防我们写批评材料。但是，假如你要写点什么好事儿，就什么都让你看，不过要事先告诉党委会：你到哪儿去，去干什么事。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我们也曾经去过那里。蒸汽管道曾出现‘破口’。我们心里十分着急。听说一家外国代表团快要来了，他们对此感到害怕。他们知道，这是不允许的。而在我们这里，他们对此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只要汽笛一响，就谢天谢地！’

“文章发表之后，人们都说，我对这次事故有些预言。可是我没有预言过。要当这样大的灾祸的女预言家卡珊德拉^①可了不得……但从内心想，一旦我做个正直的人，会不会出什么事。因此，我心里很不平静。我还有所担心，因为我有时说的是一套，而实际做的又完全是另一套。人们议论着这件事，议论来自安全技术科。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担心的呢？有一次，有人来我这儿，带了些文件，叫我看

① 卡珊德拉——希腊史诗中特洛伊国王普里安的女儿。阿波罗曾授以预言的才能。但因她拒绝阿波罗的爱情，他使她的预言无人相信。——译者注

了一些数字、事实和其它一些我并不懂的东西。当时我没有把它写出来的勇气，我知道，象这样的材料一般是不让发表的。

“我仍然心有余悸，因此，一直想离开这里。说实话，我还想带走孩子。我有个10岁的女儿，她正在生病。”

事故的发生

1986年5月，在基辅的一家医院里，我结识了一些年轻人，他们是：28岁的操纵轮机主任工程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加吉内依；约莫29岁的氮—氧测量站空气分离机仪器工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邦达连科；34岁的工程师尤利·尤里耶维奇·巴达耶夫。共同的遭遇把他们连在了一起：他们都在病危时进了医院，同在一病房里渐渐脱离了危险。特别是，这一想象不到的事件将他们的一生分成了截然不同的时期，即事故之前和事故之后。就在发生事故的那个可怕的夜晚，他们都在核电站上班，而且就在发生事故的机组旁边。

他们以平静的语调，详细叙述了所发生的一切：两次强烈震动使